

1980年3-5 (23-5)

文史通讯

- 李维汉同志关于撰写回忆录的意见..... (1)
- 本会向老同志广泛征集革命史资料
获得热烈支持..... (2)
- 老同志来信摘登..... (3)
- 编写中华职教社史的一点体会..... (6)
- 社会组召开座谈会, 广泛征集
华侨史资料..... (8)
- 积极征集工商经济史料, 为实现四化
贡献力量..... (9)
- 罗章龙委员正在撰写回忆录..... (16)
- 溥杰专员打算写长篇自传..... (16)
- 史官的楷模..... 雷凌 (10)

史料摘登

谭余保同志对陈毅同志的

- 一次误会..... 谭汤池 (11)
- 捉放李特的见闻..... 阎捷三 (11)
- 从卡拉奇到上海
——李宗仁先生归国片断..... 程思远 (13)

地方文史资料动态

- 天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各业务
组举行迎春茶话会..... (14)
- 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举行全体会议..... (17)
- 山西省政协加强
文史资料工作..... (18)
- 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纪要..... (19)
- 江西文史资料工作情况..... (20)

简讯

征稿

- (21)
- (22)

注意
内部
保存



1980.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

李维汉同志关于撰写回忆录的意见

现在写历史材料，最主要的是两个字：“真实”。就我这几年接触到的一些回忆录来看，要做到这两个字很不容易。要搞唯物主义嘛。要很严肃地对待撰选回忆录。这是个学风问题，也是一个党风问题。写东西，要经过很严肃的核实，不符事实的要删掉。只要真实的，就可以。

共产党员写回忆录，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有个党，要注意党的领导。现在有些人对这方面是不管的。第二，英雄人物，有全国的、省的、县的、工厂的、农村的、军队的、游击队的。我赞成写中下层的领袖。一个烈士，写三五句话也是个传。中上层有人注意，中下层没人注意。没有中下层哪来的中上层？没有无名英雄怎么有有名英雄呢？没有他们怎么能有全国的最后解放呢？还有一个集体关系，什么事情都是一个人指挥？都有三两个人商量嘛。一个党、一个群众、再一个集体，三方面照顾到了，才是共产党员的回忆录。大革命初期，不是毛主席一个人嘛，在中央苏区，他当书记，工作做的最多，在全国快解放时，全党决定问题，他一个人出来说话，但还有一个书记处。

（引自李维汉同志在西安事变小组座谈会上的讲话）

本会向老同志广泛 征集革命史资料获得热烈支持

为了响应党中央关于老干部写革命回忆录的号召，进一步贯彻五届政协会章关于征集革命史资料的规定，以完成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生前提出的搜集文史资料工作任务，最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向全国具有长期革命经历的老同志发信，广泛征集第一手革命史资料。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信中指出：“做好这项工作，对于研究革命史和教育青年一代，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是继续批判林彪、‘四人帮’唯心史观的需要”。

这封信要求老同志将“亲自参加过的一次或几次革命斗争史实”或“个人参加革命的历史”写成回忆录，以作为革命史资料。为了有计划地征集和便于就某一事件组织有关同志座谈，信中还希望老同志能简要地将主要革命经历提供本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开展的这项工作，在广大老同志中得到了强烈的反响和热烈的支持。许多老同志来信表示：“这是一项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工作，是我们老同志有生之年应尽的光荣职责”。他们说：“发动老干部回忆斗争历史，撰写革命回忆录，将有助于总结革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可以教育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青年一代，继承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同心同德，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许世友等同志在外地，特地让人打来长途电话，表示支持；张平化、王新亭、陈再道、王观澜、李运昌、毛齐华等五百多位老同志寄来了简历或回忆录；谭冠三、赖际发等同志身患疾病，就让亲属帮助回信。还有许多同志目前正在亲自撰写或口述请人整理回忆录。

自从这次发信以来，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征集到的革命史资料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一倍以上。目前这项工作还在继续进行。

（上接第8页）某一专题的比较完整的华侨史。又如华侨中老一辈知名人士陈嘉庚等人，他们的事迹，有许多是值得写或史料的，现在知道他们具体历史事实的人已经不多，有必要进行“抢救”。李勉之同志说，新中国成立时，在印尼，当爱国华侨升起五星红旗时，少数蒋帮分子就曾企图阻挠，展开了一场“护旗”斗争，这些都是很好的史料。有的同志提出，最好能根据各地的历史情况，拟出一个大概的提纲，便于有目的地征集和撰写，必要时，希望侨联能够给予协助。

座谈会最后根据建议，准备会后再邀请一些归侨人士，共同分成印尼、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几个小组，每个小组三五人不等，由一位同志负责召集、分别具体研究如何征集和撰写史料文稿。会上个别同志还提出了准备撰写史料的具体题目。

老 同 志 来 信 摘 登

按：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向老同志发出征集革命史资料信函后，收到全国各地许多老同志热情洋溢的复信，现将部分信件摘录发表。

马辉之（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进行了波澜壮阔的伟大革命斗争。发动老同志回忆斗争历史，撰写革命回忆录，将有助于总结革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可以教育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青年一代，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同心同德，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所以，我完全赞成来函所述的意见。

王志远（一九二四年参加革命）

我愿以高度的革命热情，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与实事求是的态度，把过去的革命斗争写成回忆录，作为在晚年的时候，对党和人民的贡献。

黄霖（一九二九年参加红军）

你们来信收悉，很受感动，我很赞成，个人早已有这种想法。去年我去看耀邦同志时，曾向他提到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革命所走的道路是最长的，最艰苦、复杂的、曲折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我们党经历了许多公开的，半公开的，和秘密的斗争，其中有成功和失败的但又都是宝贵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和记下来，以便将来作研究。

在打倒“四人帮”后，我的确想写点东西，但因身体关系，至今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写上百十字，手就痛，眼睛又不行。体息了的人，想找人帮写，实有不便，希望组织上加以解决。

伍辉文（一九三〇年参加红军）

撰写革命史料，不仅对青年一代有教育意义，对我们在革命战争时期亲身参加战斗和其它工作的人来说，也是重新学习的一种方法，虽然我政治思想和文化水平不高，力不从心，但愿尽可能提供点素材供参考。

张平化（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

我接触面不宽，知道事情不多，而且大部分忘记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写点回忆录。写长篇不行，一个一个片断地写，挤时间，也许集腋能成裘。

肖志贤（一九三二年入党）

在战争年代，我头部、腰部和手负了伤，留下了后遗症，造成脑力的严重衰退，经常头痛失眠，不能过多地思考和回忆问题，撰写革命史资料亲自执笔比较困难，口述请人记尚未找到合适的人。不过，我相信这些困难还是可以克服的。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我准备撰写个人参加革命的历史。

赖观水（一九三一年参加革命）

撰写革命回忆录是我多年来的愿望，早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就有了初步的准备，但因工作繁忙，一直没有认真地来写。文化大革命中，我的愿望不敢再多加考虑。而现在我的身体很不好，冠心病使我失去了工作的能力，多年来的愿望眼看就要破灭了，接到你们的来信，我喜出望外，热切地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帮助，写好革命史料，为党的事业作出一点贡献。

刘大煜（一九二六年参加工会和农协的革命活动）

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曾积累的一些资料都毁了，因此，写起来就困难了。但不管怎样，我想只要力所能及，就尽可能写一些，以响应周总理的生前号召。

秦化龙（一九三〇年入党）

党中央号召写革命回忆录，我作为一个党员干部，坚决拥护，并很愿意在这方面作点我应作的工作。只因为我文化、思想水平有限，加之我身患脑血栓偏瘫疾已十年，所以有力难从心之苦。由于这一工作不限时日，我还是尽量写出我所知道的一点。现我初步考虑，写一点个人参加革命的历史，主要是红军时代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往事的回忆。

马琮璜（一九二八年参加农民协会的革命活动）

我退休以后，回忆起过去战争年代的岁月，常感念万分，促使自己提笔，想把过去的经历写成回忆录。目前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的经历已初具轮廓，打算继续写下去，乘自己身体尚好，记忆力尚佳之际，记录下来这些革命资料，以期对后人有所益处，对您们的工作有所帮助。

嵇直（一九二二年参加革命）

过去我总认为写回忆录，是为自己树碑立传，徒务虚荣，而今这种片面思想，已在克服。有生之日，我定写出来，不负同志们的希望。

张兴开（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

写革命回忆录，这早已是我们的心愿，但是由于我们这些人都年已花甲，记忆力有很大的减退，对一些事情的时间、人物、地点都记不太清楚了，也无法进行考证，同时由于职务的限制，对一些事件了解得不全而，再加上“四人帮”的大棒，哪还敢写什么回忆录。现在情况大不一样了，我们这些老同志，虽然身体有病，年老体弱，不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了，但写革命史，教育下一代，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周文相（参加红军长征）

当我接到这封信后，心里十分激动，我不知如何回答，只好流着眼泪，不会写也要请人帮助写，这是同志们对我的希望呀。现在，我已是近七十岁的人了，我决心以实际行动为四化作出贡献。

程荣耀（一九三一年参加红军）

你们的来信我收到了，这充分体现了党对我们老同志的关怀，你们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我很受感动。我因病在家休养这几年，也写了点回忆录，正在发愁无人整理，正在这时接到你们的来信，我非常高兴。

夏明（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

听说要组织同一事件的老同志座谈，我感到很高兴，老战友们相见，想必对回忆大有益处。如果我能出一点力，我会很高兴的。

黄静汶（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

我做的工作只是革命洪流中极小的一滴水珠，没有什么可写的，但我愿在你们征集某一革命史实、某一烈士事迹时，能贡献微力。

漆远渥（一九三一年参加红军）

我可以写点东西，早就想写点什么，只是我长期犯心脏病和眼睛负伤失明，迟迟不能动笔，如果组织某个问题和专题座谈，只要可能，我尽力参加。

张如屏（一九二六年入党）

我已年逾七十，加上工作繁忙，很难亲自执笔写稿。党委已责成院宣传部副部长以及其他四位同志协助我进行这项工作，由我口述，请他们记录、整理。

李克如（一九二六年入党）

关于撰写革命史资料，这是我一个责无旁贷的工作，但要把史实写出，必须加以细致的回忆，并且光靠回忆还不行，有关时间、人名、地点还得要旧地走一趟。因此，我准备四月间先去北京，再转湖北、湖南、江西，特别是湖南和井冈山要去重走一遍。

李庚（参加“一二九”时期南方学生运动）

我想主要可写的有：（一）南京地下党活动；（二）南方的“一二九”运动；（三）武汉时期党领导的青年运动（重庆、桂林）；（四）苏北地区新四军的斗争；（五）苏北、山东解放区文教方面的工作；（六）关于苏北的刘彬、曹荻秋，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曹孟君及何伟同志的回忆。

徐深吉（一九二七年参加党领导的农民运动）

关于写革命史资料，论时间五十几年，应该有材料可以写，但是对我这个从来未写过文章的人来说，确实难以写出象样的文章。为了响应号召，我尽力回忆，不能写出系统的文章能写点片断的小文也可。

郑伯克（二十年代末参加革命）

对征集革命史料，组织撰写革命回忆录的工作，当尽力支持。

姚远方（一九三八年赴延安）

革命史资料征集，确有意义，愿尽力支持。

编写中华职教社史的一点体会

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史编写小组

中华职业教育社，一九一七年创立于上海。提倡职业教育，业余教育。兴办职业学校，补习学校，专科学校和函授学校，举办职业指导所，职工培训所，出版《教育与职业》、《生活》、《国讯》、《展望》、《函授师范通讯》、《语文学习讲座》等刊物。在海内外有一定影响，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一定位置。编写社史，总结经验，对我们今天研究教育体制，不无可供借鉴之处。

一九七八年冬，在全国政协和政协上海市委员会领导下，组织力量，分别成立北京、上海两个社史编写小组，一九七九年增设云南小组。一年多来，曾召开多次会议，讨论和制定了《编写社史规划的初步设想》、《社史提纲》。广大社员、校友，积极响应，提供史料，现已收到史料八十余篇。主要有：中国共产党对职教社的关怀、指引以及一些中共党员在社的事业中的作用的资料，提倡和兴办职业教育、业余教育的材料，社员校友回忆社的工作和生活的材料，同时还征集到一些散在个人手中的刊物、图片、年谱、小传等原始材料。目前，《社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已经编出付排，第二辑正在集稿中，草拟的《社史提纲》，也已分发各地有关人士征求意见。

在征集史料，编写社史工作中，我们有以下的点滴体会：

一、掌握编写工作的原则

写史，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编写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在工作中，要努力掌握这一原则。

写社史，要十分严肃地尊重事实。中国共产党对职教社的领导和影响，要实事求是地写够，但是不能把党所领导的地下工作，记到职教社的帐上。例如，许晓轩烈士等很多共产党员是职教社的工作人员，但是他们的活动是党直接领导下的地下活动，不能把他们的活动写成是职教社的活动。又如，《生活周刊》是职教社创办的，开始主编《生活》的人是韬奋，但是发展到一定时期，《生活》同职教社分开。以后的《生活周刊》，生活书店，在国内外发生很大影响，这与职教社就没有多大关系了。这一切都要努力学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反映，有三分就写三分，有七分就写七分。既不可夸大，也不要缩小。

二、确定编写工作的重点

职教社不但历史悠久，而且除办学外，还办过工厂、农村改进试验区、新农具推行所、职业指导所、伤残重建处、难民收容所等许多事业，培养了大量生产

技术和经营管理人才,联系和推动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历史长,头绪多,编写社史,如何正确反映这一团体的发生、发展和转变的过程,开始不知从何写起。经过学习,讨论,反复研究,才逐渐明确:职教社是旧中国的一个为适应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需要而产生的教育团体,有理论,有实践。它从为民族资产阶级服务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是通过它的教育实践来表现的。社的历史,同经济史、政治史有关系,但它是教育史。因此,编写社史,要作为一个教育团体来写,着重写它的教育活动,总结它的办学经验,从而为今天的四化事业作出它应有的贡献。

三、划分发展阶段,进行编写工作

一个团体的历史,有它的全过程,又有全过程中的各个阶段。职教社六十多年的历史,它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三七年,主要是倡导职业教育、兴办各种类型的职业学校,出版《教育与职业》、《生活周刊》等刊物,第二个阶段从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一面继续举办教育事业,一面参加爱国民主运动,政治色彩日益浓厚,从一个教育团体发展成一个政治派别,政治上逐渐转变到拥护和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立场上来。第三个阶段,从一九四九年六月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项事业逐步纳入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轨道。编写社史要划分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各个阶段,各有不同的侧重点。

四、争取党的领导,依靠群众和有关单位的支持

征集史料、编写社史的工作,是在党的关怀下着手进行的。我们在工作中,努力争取党的领导,依靠群众和有关单位的支持。全国政协党组同志,经常关心和亲自过问社史的编写工作;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政协上海市委会文史办公室给予具体的帮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从编写规划开始,一直给予关注;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和两会上海市组织帮助我们解决了一些具体困难。

社史小组,没有专职编辑,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都是兼任或借调的。小组采取集体领导,个人负责的民主集中制,每周定期碰头一次,汇报和检查上一周的工作,讨论和布置下一周的工作。对外联系,搜集、整理资料,编写社史等各项具体工作,指走专人,做到事有专管,责有专成。

五、整理和发掘档案材料

发动社员、校友和有关人士撰写回忆录,提供材料,是征集工作的一个方面;但因年代久远,参与早期社务活动的人,多已去世,今尚健在的,凭记忆撰写材料,也难以做到完全准确可靠。因此,对于保存下来的档案材料,要搞好整理发掘的工作,既为编写社史提供较为全面系统的资料,这些资料,还可以提供有关部门参考。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社会组召开座谈会,广泛征集华侨史料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七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社会组召集在京的部分归国华侨知名人士,研究讨论征集和撰写有关华侨方面的历史资料。到会二十人。座谈会由社会组副组长庄明理同志主持。

到会同志一致指出,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经历过许多坎坷岁月,而旅外华侨对于祖国的兴衰荣辱,无时无刻不寄予极大的关怀。广大华侨是爱国的。当祖国处于灾难深重的时刻,华侨总是竭尽全力从各方面给予支援。他们为祖国在反帝斗争和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他们多年来对于侨居国人民的反殖民统治,以及当地的经济建设、社会繁荣,同样作出了贡献。回顾一下华侨的历史,上述这些方面可歌可泣的事迹是很多的。朱学范同志说,孙中山先生早年的革命斗争,就曾得到过华侨的支援,俄国十月革命以及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等重大国际事件中,华侨同当地人民一起,也曾流血流汗付出了极大的牺牲。

有的同志指出,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对华侨横加歧视和迫害,任意扣上什么“里通外国”等等莫须有的罪名,使许多归国华侨蒙受不白之冤。最近时期,通过落实政策,正本清源,许多问题,得到了澄清。但今后还需要从多方面做些工作,包括广泛征集和撰写华侨史料,以继续端正视听。不少同志对华侨的历史作了简要的介绍。李平衡同志说,我国人民侨居国外的历史已有几百年,可写的历史很多。邱及同志说,早年出国的华侨,大都是为了谋求生计,他们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一部分从事工商业者,也属于民族资本,和帝国主义的掠夺资本是不同的,我们写历史就要实事求是,把华侨的面目写清楚,使人们认识华侨是同胞兄弟,应根据党的政策,正确对待。

对于如何收集和撰写华侨史料的问题,到会同志提出不少建议性意见。庄明理同志说,现在有些侨居国当局,也在收集撰写华侨史,但那是根据他们的需要写的,有的是为殖民主义服务的,不能反映华侨的真实情况。我们应该把华侨和当地人民的友好关系,对当地的经济繁荣作出贡献的真实情况写出来。有的同志还提出,听说台湾当局现在也在写华侨史,可是他们的一些论点是极其荒诞的,这就更需要我们及时写出正确观点的华侨历史来加以纠正。洪丝丝同志说,我们现在必须明确当前的任务是收集和撰写“文史资料”,而不是要求写成完整的、系统的历史。因为写成一本完整的历史,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从史料入手,就容易得多。只要自己经历过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即使是片断的、局部的就可以写成史料。有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集腋成裘,那就可以整理修订成为(下转第2页)

积极征集工商经济史料为四化贡献力量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在北京举行了全国代表大会。为了推动各地工商界积极开展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和两会全国代表大会办公室于十月十八日下午联合召开了文史资料工作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部分地区两会代表三十七人，其中大多数是在当地政协担任文史资料工作的，也有一些是撰写文史资料的积极分子。

座谈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长史永同志主持。他在讲话中首先指出文史资料工作的重要性。他说，为了向近代史研究工作提供素材，为了教育后代了解革命斗争的历程，文史资料工作必须进一步开展，发挥其重要的作用。而就当前来说，全国人民正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有关工商经济方面的史料，作为实现四化的借鉴，有其现实意义。因此，文史资料工作决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各级政协和各民主党派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史永同志要求大家一定要用“只争朝夕”的精神“抢救”文史资料。他说，目前各地政协和民主党派的成员，大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应该动员他们把一生的经历和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传之后代，这也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征集史料的范围可以扩大到全国解放以后，包括文化大革命。他希望今后省、市政协组织与全国政协加强联系，紧密合作，交换文史资料，交换史料目录，以便共同把文史资料工作搞好。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徐盈同志、工商组组长吴雪之同志和经济组组长吴觉农同志也都在座谈会上讲了话。他们希望两会的成员多提供有关工商和经济的史料，为实现四化贡献力量。

在座谈会上发言的还有部分地区两会代表，他们是：青岛市的周志俊、济南市的张东木、杭州市的童泉如、安徽省的胡庆照和上海市的姜庆湘。

这次座谈会开得时间虽短，但大家思想解放，踊跃发言，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有不少代表由于时间关系，来不及发言，但在会后表示，他们回去以后，一定要把座谈会的精神向当地政协的领导同志汇报，积极发动各方力量，把文史资料工作开展起来，为实现四化贡献力量。

（上接第10页）当年的史官，对“裁”的观念怎样，姑且不论，但他们这种为了保存历史的真实，置生死于不顾，不畏权贵，不屈豪门，“我以我血荐轩辕”，气吞河岳、大义凛然的节操，为史官树立了极其可贵的榜样！

“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史学工作者应该拿这面镜子照照自己。

史官的楷模

雷凌

“崔武子见棠姜而美之，遂取之。庄公通焉，崔子弑之。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见《纲鉴易知录》·《周纪》）。

短短六十七字，说明了春秋时代齐国统治者的乌烟瘴气，政变分子的残暴，特别是记述了史官风霜其操，铁石其心，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感人肺腑，壮人心志，遗芳余烈，至今为人们称颂不已，为史学工作者树立了楷模！

崔杼，酒色之徒，本来就不是个好东西。棠公死，崔杼往吊，见到棠公的孀妇棠姜，便横生歹心，霸为己有。而齐庄公光，身为齐国君主，不思除淫风而正国法，却又和棠姜私通了。姜至拿着崔杼的帽子送人，对崔杼公开羞辱，被崔杼杀了。

事情发生在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庄公六年，即公元前五四八年，距今二千五百二十余年以前的所谓齐鲁之邦。当时的观念是，不问国君怎样荒淫无耻，臣下杀了他，是以下杀上，就是大逆不道，就是乱臣贼子。故太史伯在史简上写道：崔杼弑了他的君王。

崔杼一见史简，大为恼火，就把太史伯杀了。太史伯的二弟太史仲，不畏强暴，秉笔直书，照样写下了“崔杼弑其君”，崔杼再展淫威，又把太史仲杀了。可能崔杼认为，敢写我以下杀上者，就是在太岁爷头上动土，我就宰了他！然而，太史的三弟太史叔，并没有被这种血腥的屠杀所吓倒。他踏着两个哥哥的血迹，还是照书不误。权赫一时的崔杼，肆无忌惮，又把太史叔杀了。为了这句实录，一连杀了三位史官，可以说是残暴空前的。

可是，邪恶永远战胜不了正义，凶残的刽子手越是杀人溅血，血光越是会伴随着正义象犀利的电光一样划破黑暗的夜幕。太史季听说三个哥哥都被杀了，他满怀悲愤，以满门光辉煌照青史、一腔正义射斗牛的气概，忠诚于自己太史的司职，秉他的三位哥哥那样，为正义而死，决心以生命换取史册的真实，书法不隐，仍然照写：“崔杼弑其君”。崔杼在这特英烈霜节的征讨下，对奋笔无所阿容的史官毫无办法，只得赦了太史季。千百载后的今天，读到这篇富有生命力的壮烈史页，对直笔史官，令人肃然起敬！

更可贵的是南史氏，他是齐史之外的史学家，听说太史尽死的消息，但为了历史的真实和历史学家的神圣任务，“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以抽戈犯蹊之慨，英勇仗气持简前往，准备冒死照书。及途中知道太史季已经记载了此事，便悠然回去了。浩然正气，多么可贵可敬！（下转第9页）

谭余保同志对陈毅同志的一次误会

谭 汤 池

中央红军长征之后，我们在湘赣边区坚持游击战争的同志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严峻考验。特别是湘赣省委书记、军区政委陈洪时叛变后，我们的斗争更加艰巨了，在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同志的领导下，建立了新的省委，继续高举红旗，与敌人作了坚决的武装斗争，使这块红色土地上一直燃烧着革命的火焰。

一九三七年十月，傅茨喜等同志从段焕竞、刘培善同志那里送来了一个人。他，就是陈毅同志。陈毅同志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国共合作抗口的指示。当时，由于我们同党中央断绝联系已几年之久，对外面的形势了解甚少，虽然在报纸上看到了“西安事变”，红军改编成八路军，“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改为“特区政府”的消息，经过分析也估计到中央的路线有了新的变化，在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的情况下，同国民党暂时妥协是可能的。但是，严酷的现实斗争环境又不能不使我们对敌人的宣传和来到山区的人保持高度警惕。那时候，我们的同志还在天天流血，敌人还在逼迫一些红军家属和群众上山劝降。我们过去由于缺乏警惕而被叛徒出卖造成流血的教训太多了。所以，对陈毅同志一来就谈起国共合作，我们是非常怀疑的。加之陈毅同志只身进山，只带了一张署名项美的介绍信，手续不全，我们无法证实他的身份。当时，虽有些江西战士证明陈毅同志是江西军区的司令员，谭余保同志也认识他，但是，省委书记陈洪时都叛变了，就是军区司令员，我们也不能轻易相信呀！

我们把陈毅同志当作“叛徒”抓了起来，并准备杀掉。这时，陈毅同志毫无受冤之意，他反复讲道理，耐心地启发开导我们。他讲了整整一天一夜，终于使我们感动了，暂时没有对他采取措施。接着，我们派人下山，去吉安找新四军办事处主任曾山同志。经过了解，才知道陈毅同志所讲的都是真的。

当我们知道后，谭余保同志和其他同志都激动地哭了。谭余保同志亲自给陈毅松了绑，向他道歉。陈毅同志这时却反过来安慰大家，并主动承担了由于手续不全所造成的误会。他这种宽阔的胸怀，使我们十分感动。我们逐步知道，陈毅同志和我们一样，在赣南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我们对他更加敬佩了。在山上的不少日子里，陈毅同志亲自写信给茶陵、攸县、莲花等地的国民党政府，宣传抗日统一战线政策。

我们终于等到了胜利的一天。不久，按照党中央的指示，除留下部分同志由谭余保同志领导，继续坚持边区斗争外，其余武装部队改编成新四军第二团，在段焕竞、刘培善同志带领下，跟随陈毅同志奔向抗日前线。

捉放李特的见闻

阎捷三

一九三五年八月底，毛主席、周副主席率领红军右路军，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走出了茫茫的草地，来到了四川、甘肃交界的巴西地区。当时，我们刚刚组建起来的红军大学，跟随右路军行动。我在红军大学政治科当军事教员，政治科亦称政治大队，政委是董必武同志，

教员还有成仿吾、陈明等同志。“红大”的学员，大多是在懋功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由四方面军抽调来的，教员主要是一方面军红色干部团的同志。

巴西，是个小小的镇子，周围都是草坪，右路军各部队分散驻扎在草坪上。没想到，就在这个小小的地区，爆发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一天深夜，我们还在熟睡之中，突然，上级来了一个紧急通知：“凌晨出发，做好行军准备。”

四点钟，天已经蒙蒙亮。随着部队集合的哨声，我们政治科的同志迅速地集合好了。我向四周看了看，宿营地的草坪上集合了许多部队，正在整装待发，前面的部队，已经开始向北面的方向出发了。我心里暗暗地猜测，大概要打一场大仗了。

忽然，附近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只见几个人骑着马风驰而来，领头的是个矮胖子。他们来回跑着，冲着部队叫喊：

“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走了！”

“不要跟毛泽东、周恩来他们走，他们是苏联的走狗，要把你们带到苏联去！”

“毛泽东、周恩来北上逃跑，投降帝国主义！”

.....

开始，大家都不知怎么回事，等他们重复喊了几遍，就象空中投下了一颗炸弹，在部队中炸开了。人们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一些四方面军的学员附和着喊叫：“我们不走了！”“不能跟他们走！”我和许多同志听到他们骂毛主席、周副主席，十分气愤，可又闹不清他们究竟要干什么。前面已经出发的部队也停下了脚步。刹那间，部队骚乱了。这时，我看清了，领头的那个人是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他原来是四方面军的参谋长。

正在这个时刻，一个大个子突然疾步上前，拦住了李特，说了三言两语，就把他从马上拉下来，两人对吵了起来。我认出来，这个大个子，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德国人李德，他犯了错误，在遵义会议后，从红军指挥机关下放到红色干部团，后来又分到红军大学。

两个人激烈地争吵着，我们在一旁的几个干部不由自主地围了上去。李特的几个随行人员也下了马，在几步之外，持械相望。只听到李德讲一口外国语，叽哩咕嘟，不知说些啥，李特除了高声重复那几句喊话外，其它就是说“不去！不去！”你一言我一语，吵得面红耳赤，几乎要动武。我们在场的人都疑惑不解，一时惊呆了。

记得一个月前，红军大学刚刚成立时，李特从四方面军调来，因为他在苏联留过学，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李德也会讲俄语，所以，他俩碰到一起，总是用俄语说个没完。没想到今天他俩之间，会发生如此一场争吵，而且奇怪的是，李特明明知道李德不懂汉语，却偏偏用汉语说话。

我搔了搔身边的陈明，请他帮助翻译。陈明同志也在苏联学习过，懂得俄语，他就小声地向我解释。原来，二李之争是因为李特来传达张国焘的命令，要把四方面军的同志带走，不再北上了。李德不许他胡闹，要拉他去见毛主席。并再三说明，北上抗日是正确的方针，不经毛主席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把部队拉走。而李特执意不去见毛主席。

这样，我和其他一些同志开始明白了，李特是代表张国焘这些人来拉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去的，他们破坏右路军北上抗日，要和我们分道扬镳，这是一个破坏红军团结的大阴谋啊！我不禁又联想起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后，听到的一些谣言。有人说什么，四方面军是工农分子，一方面军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是无产阶级的军队。他们荒谬的理由是，一方面军讲究衣装整洁，而且许多人口袋里还别着一枝笔。其实，那时候，好些同志口袋里只是装着一

枝小木棍，为了在行军、宿营时，可以随时拿出来，在地上划一划，学习文化。张国焘一伙采用造谣的手法，散布宗派情绪，挑拨离间，制造两支红军队伍的隔阂，这说明了他们早有异心。今天果然证实了。

正当二李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只听到有人喊了一句：“毛主席来了！”骚乱的人群蓦然安静下来。我见到毛主席和几位领导同志从西南边不远的的一个茅棚里走出来。在人们的簇拥下，李德扭着李特向毛主席走去，一路推推搡搡，吵个不停。我也跟着走了过去。

茅棚外，在毛主席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面前，李德松了手。只听毛主席高声地说：“不要吵了！我们都是红军，都是共产党，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现在不愿意北上的也可以，以后我们还会在一起嘛！捆绑不成夫妻，谁愿意走，放他们走吧！”显然，毛主席早已了解了情况，他神情自若，侃侃陈词。李特无可答对，听得一个“放”字后，便慌忙上马而去。接着，毛主席果断地下了命令：“立即撤出此地，赶快向北前进！”

我和陈明迅速跑回自己的单位，对四方面军的学员说，你们愿意回去的，就回去吧，我们不强留。结果，留下的是一方面军的同志和个别四方面军的同志，其中还有炊事员等勤务人员。

太阳出来了，我们向着北方，踏上了新的征途。

（石肖岩整理）

从 卡 拉 奇 到 上 海

——李宗仁先生归国片断

七月十四日凌晨，瑞士航空公司班机在巴基斯坦首府卡拉奇机场降落。飞机刚刚停稳，一辆巴基斯坦特别警车飞快地开到飞机下面，立刻有几名警官、警士登上了我们所乘的飞机，在客舱里询问旅客，谁是从苏黎世来的程先生？我想，原来说是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来人接我们，怎么变成几名巴基斯坦的警士呢？我依然回答说：我就是。他们便客气地让我和李宗仁先生、郭德洁女士下了飞机，进了那辆特别警车。车里坐着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他伸出手来向我们做了自我介绍，并说是奉周恩来总理之命来迎接李宗仁先生夫妇的。这样，我们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原来，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事先接到各方面的情报，台湾当局已经从欧洲到香港的所有重要机场都布置了特务，以便等李宗仁先生一出现就干掉。丁大使获此情报已是当天夜晚了，他在极短的时间内采取了重要的安全措施。

中国大使馆原来在市内为李宗仁夫妇准备好一家舒适的豪华旅馆休息，因为情况变得险峻，丁大使只好邀请我们暂住到中国大使馆里面。李宗仁先生欣然同意。他被请到陈毅副总理访问巴基斯坦时住过的房间。

为了安全，丁国钰大使劝李宗仁先生在大使馆内暂住几天，等摸清情况再动身。并告诉我们，周总理已经访问非洲回来，他正在亲自过问此事。

七月十七日深夜十二时，我们乘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波音七〇七客机离开卡拉奇……事后我们才了解到，十七日晚，周总理一直在等待着我们的消息，直到十八日凌晨，我们所乘的波音七〇七飞机进入了祖国的上空，他得到报告后才去休息。但几小时后，他又和陈毅副总理一同到上海飞机场迎接李宗仁先生了。

（摘自程思远先生回忆，王观山整理的《李宗仁先生归来前前后后》一文，全文将另发表）

天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各业务组 举行迎春茶话会

(天津市文史办讯) 为了迎接八十年代第一个春节,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经济史料组、科技文教组、革命史组、工商史料组、政治军事组分别举行迎春联欢茶话会。

经济组茶话会由市革委委员、市民建、工商联副主委、政协经济史料组组长杨天受主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市政协副秘书长李周行、副秘书长王久、乔维熊出席了茶话会。

首先,由八十四岁高龄的杨天受代表政协文史委员会向到会的同志们致以热烈的新春祝贺。他在讲话中回顾了经济史料组成员和社会老年人士在过去一年中为文史资料工作积极努力做出的成绩,已经征集到有关经济史料七十多篇,共四十五万字,不但超额完成原计划三十篇,三十万字,而且征集到一批有价值的史料,如保险业、粮食批发业、五金业、中南银行、大陆银行、振华造纸、寿丰面粉、中国旅行社,以及一些经济界著名人士如寿丰孙家与中孚银行、北洋纱厂与朱梦苏、永明漆厂与陈调甫等资料,特别是由于金融专业史料小组的努力,有计划有步骤地征集到一批有关天津银行与钱庄的史料,同时,加强了与社会老年人士的联系,活跃了政协工作,调动了老年人士的积极因素,对宣传党的政策,了解社会老年人士的情况,促进安定团结,推动四化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他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在金融、财政、税收、外贸、海关、盐务、海运、矿山、农林、水利、铁路、交通、邮政等方面继续挖掘稿源,提供史料线索,推荐人材,兢兢业业和扎扎实实地把经济史料工作做得比以前更好,使政协文史工作真正成为社会老年人士为四化贡献力量的一条途径。

李周行代表市政协对与会老年人士致节日祝贺。他赞扬金融史料专业小组和经济史料组全体成员在征集、整理和编写经济史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希望经济史料组在伟大的八十年代把工作做得更好,特别是在征集史料为四化建设服务工作中做出出色的成绩。

茶话会开得生动活泼,笑语不断。杨固之、张章翔、谈在唐、董少臣、朱继珊、刘续亨、杨骏昌、唐宝心、许树华、陈隽如等相继发言。

工商史料组于二月七日邀请全组成员、市民建各区工委和积极提供资料的退休老年工商业者五十余人,举行茶话会。

茶话会由市政协副主席、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工商史料组组长何宗谦主持。他首先代表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向到会人员祝贺节日,他说:“对于政协文史

工作，要追补被林彪、“四人帮”破坏损失了的宝贵时光，抢救第一手有价值的史料，把有关天津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生、发展和改造的史料征集到手，一天也不能耽误！”他在发言中回顾了工商史料组一年来的工作成绩，即撰写出四十多篇稿件，有九篇反映解放前夕民族工商业奄奄一息的资料已选入《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还有关于“劝业场一带的变迁”、“天津早期商业中心”等稿件准备陆续刊登《选辑》，供研究部门参考。同时，一年来，加强了与退休老年工商业者的联系，活跃了政协工作，而且对宣传党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安定团结，推动实现四化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市政协副秘书长李周行、副秘书长王久、乔维熊出席茶话会。李周行同志代表市政协对工商界老年人士一年来辛勤撰写文史资料表示感谢，并勉励大家要信心百倍，鼓足干劲，继续提供更多更有价值的史料。

茶话会上，大家为党对工商界的亲切关怀，深为感动，抚今追昔，激情满怀，畅谈大好形势，热情赞颂党的领导，对于能在晚年从事文史资料的撰写与整理工作，为实现四化的壮丽事业添砖添瓦，心情格外兴奋，发言踊跃，笑语盈盈。

科技文教组于二月九日举行迎春茶话会，教育、医备、新闻、音乐、文艺、工程科技，曲艺戏剧、宗教等各界人士鲍觉民、李宝震、何国模、黄廷贵、郭德隆、黄植、吴云心、劳荣、骆玉笙、杨肖彭、郑汝铨等出席。政协副主席、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科技文教组组长黄钰生主持了茶话会并讲了话。他回顾一年来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在各方面支持下作出不少成绩，很多老年人参与文史资料的撰写、征集、整理工作，他指出：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也是为四化贡献力量。他缅怀周总理对文史资料工作的关怀，并要求大家在撰写整理文史资料时，要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解放思想，存真求实，还历史真面目，不能形而上学。

会上，政协副主席乔维熊对一年来天津文史资料出刊情况、科技文教组征稿近况及初步规划作了介绍。

政协副主席高长春、徐景星也参加了茶话会。

政治军事组于春节前夕邀请老年人士三十余人出席迎春茶话会。政协副主席、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政治军事组组长黄逊非主持并即席致词。他首先阐述编写文史资料工作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回顾一年来政治军事组征集稿件情况，并提出今后要求。他说提供文史资料，概括为八个字：挖潜、改进、多写、求实。最后举杯，恭祝大家新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政治军事组副组长袁东衣在茶话会上就政治军事组的工作作了介绍，他说，由于大家的努力，去年政治军事组共征集稿件一百二十六篇，约八十六万字。今年计划征集稿件三十篇，天津著名地方人士传略二十篇。此外，在编写中的《严

范孙生平资料》，今年可以完成。天津租界的英租界，已经定稿，日租界也已脱稿，法租界正在加紧撰写中。

与会人士，人人心情舒畅，个个精神振奋，会上始终洋溢着团结气氛，一致表示要多写、写好文史资料，为近、现代史研究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革命史组于二月十二日举办迎春茶话会，与会的有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和陕北红军干部李金生、何凤山、刘大煜、贾振清等同志、有在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天津地下党领导下进行革命活动的董恂如、左振玉、司呈祥、张桂英等革命老人，有参加冀中革命根据地斗争活动的苏英、张猛、张希平等同志，以及市历史研究所董振修同志，市政协副秘书长王久、李敬仁、乔维熊等同志，大家欢聚一堂，畅谈进入八十年代第一个春天的感想和以有生之年为四化贡献力量的决心。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革命史组组长李麦同志主持会议，他代表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向与会同志致以新春祝贺，并在会上畅谈了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讲话的心得体会。

李麦同志回顾了革命史资料征集工作的开展情况。指出，一年来已有一百二十多位老同志提供或撰写。革命史资料一百三十六篇，九十五万多字，被《天津文史资料选辑》选用刊登或即将刊登计二十一篇，二十四万多字。

与会的老同志人人精神振奋，心情舒畅，谈笑风生，一致表示，要在新的一年里，写好革命回忆录，让有生之年为实现四化出点力量。

许多同志指出，研究历史，除文字记载的文史资料外，老年人提供的第一手资料，是重要方面之一。特别是党史、革命史的资料，因为在当时的艰苦历史条件下，不可能留下较多的文字资料，老同志提供的亲身经历的革命史料，就尤为重要了。

罗章龙委员正在撰写回忆录

八十四岁高龄的罗章龙委员，近日向本刊编者谈了他的初步写作计划。罗老的计划是，写一部记述他个人早年参加革命活动的回忆录，包括他在新民学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方建党、劳动组合书记部、国共合作以及在湖南、上海进行革命活动的经历。另外，罗老十分怀念过去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和战友，打算整理出几十位烈士的革命活动情况。罗老还打算将他早期在《向导》、《工人周刊》、《劳动报》等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和与友人的通信，编辑成集。

溥杰专员打算写长篇自传

三月二十日，本刊编者访问了全国人大代表、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溥杰专员，向他询问新的一年写作打算。溥杰专员高兴地说，八十年代刚开始，就许多同事好友对我讲，你该写一部长篇回忆录了。原来，我也有这个想法，但没有很好考虑，经他们催促，我也觉得该写了，应该乘党的五中全会胜利召开的东风，完成一部我从宫廷出身以来，直至现在的长篇自传。

我们预祝溥杰专员早日完成这部长篇自传，希望它能象《我的前半生》一样，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